

## 忆父亲

○唐 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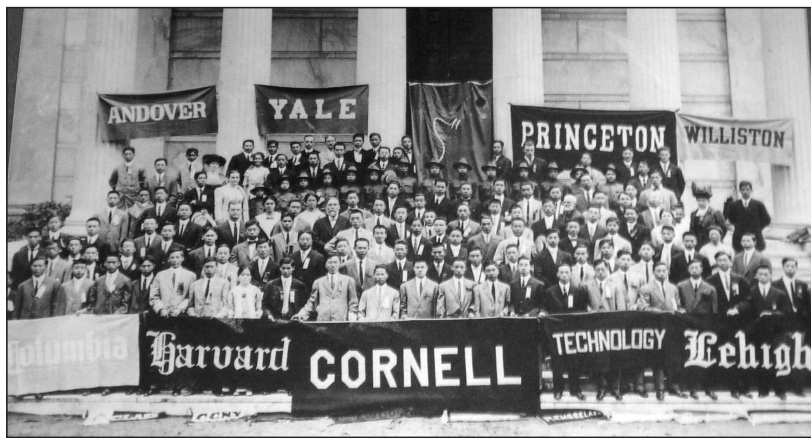
父亲唐统一 2013 年 9 月 5 日以 97 岁高龄在北京辞世。从 1936 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算起，除中间去英国工厂实习的 4 年，父亲在清华共度过 73 年的时光，可以说为清华的教育事业贡献了一生。

父亲出生在北京，祖籍是广东中山县的唐家湾。他是家里上清华的第二代。我的祖父唐悦良 1909 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考入清华，与梅贻琦等 47 人作为清华庚款留美第一期学生赴美国，就读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六年后学成回国，曾在清华大学政治系任教，后进入外交界。父亲年轻时在北京的育英中学读书，据他自己说，那时读书也不大用功，业余爱好很多，练武术，装收音机，还爱看武侠小说。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很不错，曾经是北京市

初中升高统考的“状元”。那一年高中统考的状元也被育英的一位学生获得，他们为学校赢得一块“双元”的大匾。此匾至今仍然悬挂在今天的北京第二十五中学（原育英学校）的大门内。我曾遇到过一些当年育英或二十五中毕业的学生，提起父亲都不无自豪地说：“那是我们的大师兄！”

育英毕业的学生后来不少都很有名，父亲的人缘应该很不错，与一些同学保持了几十年的联系。记得 60 年代他与母亲曾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宿舍做客，我当时很奇怪他这个理工科教授怎么会与北京人艺有联系。原来当时人艺的大导演夏淳和著名演员刁光覃都是父亲当年的育英同学，那次就是他们请我父母去吃饭。

父亲考入清华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学校南迁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读书，直至 1941 年毕业。父亲对那段艰苦的联大生活印象深刻，时常向我提起。他说那时这些年轻人的



唐悦良（YALE 大学横幅 Y 字母下）1912 年参加留美学生会时留影

思想都是工业救国，希望靠自己的知识来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再受外国人的欺负。他在联大的那些老师，如章名涛、马大猷、钟士模等先生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后来他自己也加入了电机系的教师队伍，但一直对他这几位老师十分尊重。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几十年来父亲对住在清华的章先生和钟先生的夫人无论人前人后都尊称为师母。

1943年父亲获得了由英国工业协会资助去英国企业实习的机会，同行者共33人，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中国建设现代工业的中坚人物，像“两弹一星”的元勋杨嘉墀、黄伟禄，水电权威李鹏鼎等。据父亲回忆，他们一行人先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从孟买坐船经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前往英国。那时正值“二战”期间，德国人的潜艇在大西洋经常攻击盟国的商船，国内曾误传他们这批人所乘的船只被德国人击沉，让在北京的祖父祖母大为伤心，好在后来很快澄清。由于正值“二战”期间，父亲他们这批人在英国的生活很艰苦，还经历了德国火箭对伦敦的轰炸，但他们都坚持了下来。父亲除了在英国电机制造厂作实习工程师，还注册伦敦大学，经考试获得该校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在英国四年后，父亲于1947年回到祖国。他在英国那不多的生活费攒下的钱变成了几大箱书。据他讲，回国后有几个选择，去北大可以给副教授，去清华则只能从专任讲师做起。他对清华还是情有独钟，所以选择了清华。从此直到2013年辞世，再没有离开过清华。我曾经问过他，当时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去美国继续读博士或者留在国外，他说从来没有想过到期不归。

继祖父之后，父亲成了我们唐家执教清华的第二代。解放前的清华，无论是作学生还是作教师，都给父亲留下不少回忆。我曾问他认不认识当时的校长梅贻琦，他说由于祖父与梅的同学关系，当然认识，但绝少私人往来，因为那时在清华，一是无事可求，二是也不兴这一套。父亲对于梅贻琦对清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持肯定的态度，也说起过梅的一些趣事。例如，梅这个人的风格是遇事从不明确表态，说话总是模棱两可，因此学生们曾以梅常挂在嘴上的口头语编了一首打油诗，曰：“大概可能也许是，可是我们不敢说，不过学校总以为，似乎仿佛不见得。”合辙押韵，十分巧妙。

1948年底，解放军围了北平城。清华在城外，但不少教职工家住城里，清华于是在城里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城内教职工的工资发放，分配物资，保释被国民党政府抓捕的清华职工等事宜。父亲由电机系主任章名涛先生推荐，参加了这个小组。据他回忆，其他的成员有许镇英、李宗津、陈体强、张肖虎。梅贻琦校长当时曾写了一封信，授权给他们。父亲回忆说，围城期间的一天，他去看望梅贻琦，当时梅住在协和医院的宿舍。父亲劝梅不要离开北平，留在大陆。父亲说，由于祖父与梅同学这一层关系，他与梅贻琦谈得十分坦率。据父亲回忆，梅当时坐在沙发上，听完父亲的话，他仰身向沙发背上靠去，眼睛看着天花板，只说了一句话：“我和你们不一样啊……”这次谈话不久，梅就在东单的临时飞机场搭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了南京。父亲后来总觉得，梅没有留下是很可惜的，梅带走了清华的庚款基

## □ 怀念师友

金，对清华以后的发展终究是个损失。

我问过父亲，为什么解放前夕他留下来，没有去台湾。他当年的一些熟人，后来在台湾都做了大官，像陈雪萍，在台湾做了“教育部长”。我上个世纪80年代在加拿大留学时，曾见过一些定居国外的当年父亲的老同学和老同事，他们都说，如果父亲去了台湾，以他的能力和家里的人脉关系，肯定会在学界受到重用，至少可以躲过“文革”的灾难。倒是父亲生前多次对我讲过，当时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但是对国民党政权却真正失望了。这个政权实在腐败，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共产党总比国民党要强。这应该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想法。而父亲对后来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功绩的肯定，即使他本人经历了“文革”的磨难，竟也不曾改变。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由于父亲的谨小慎微和母亲的不断提醒，他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文革”这一关终究没能躲过去。那时他五十来岁，抄家、毒打、关“牛棚”和劳动改造，一样没少。我至今仍然保留了一张1967年我给他拍的照片，照片上他穿着一身满是尘土的工作服，头戴帽子和风镜。那时他在校内每天去劳动改造，跟随运红砖的卡车，装车卸车，大约有数月之久。后来他又被发配到清华在江西鲤鱼洲的农场去改造，一去就是两年，幸运的是他没有染上血吸虫病。记得“文革”后，父亲的老朋友王先冲教授来我家串门，提起当年在鲤鱼洲，他曾经肩扛百斤麻包上三十度的坡。他是作为“当年之勇”来讲的，我当时听着实在心酸。这些时值壮年的清华教授被剥夺

了教书的权利，被强迫参加体力劳动，且受尽精神上的屈辱。因此，“文革”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都是一场“浩劫”。

父亲这个人无论从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是相当坚强的，万事皆能想得开。“文革”十年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很大摧残，但是他能泰然处之。在他93岁那年曾接受过一次采访，当问及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他说那是整个国家的灾难，比起那些开国元勋受到的迫害，他的那些境遇也就不算什么了。他的人生态度真的很豁达。

父亲与他那一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将爱国视为最基本的情操。他虽然不懂政治，但是对政治很感兴趣，对国家大事总要在家里发表自己的评论，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口无遮拦。晚年每天必看凤凰卫视的新闻与评论，去年以来尤其关注钓鱼岛问题，对日本政府的行径极为愤怒，总要将它和自己亲身经历的日本侵华罪行拉在一起批判。

父亲教了一辈子书，据他的同事和学生讲，他教的很有方法，他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但是当我问他教得好不好时，他总是说，马马虎虎吧。他尤其重视给学生讲好基础课。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时，曾经接待过父亲的老朋友常迥教授来学校访问，我为他联系见到学校的电机系主任，谈了科研合作。后来父亲也来加拿大学术交流，那时我已经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教育处工作。我为他联系了去渥太华大学参观，但他参观的重点却是学校如何安排大一学生的基础课。后来我问他，别人从国内来都是看人家如何搞科研，如何带研究生，你怎么要看大

一基础课这样低层次的东西？他说，大一基础课对学生是最重要的，关系学生今后一生事业的成败，而当时的中国高校不大重视基础课。他还说他当年在清华念书时，教大一基础课的都是名教授，使他一辈子受益匪浅。

父亲对学生是非常负责的，记得小时候家里常有学生和青年教师向他请教问题，对他带的研究生也是极其负责的，他对自己的子女的学习都没有那么下过功夫。他认为，教师教好学生是天经地义之事，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拿自己教过的学生向别人炫耀。记得“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他应邀参加电力系统的一个全国性会议，主持会议的是水电部的一位副部长，清华毕业。副部长专门到父亲下榻的房间来看望他，说自己是清华某年的毕业生，父亲教过他，问父亲是否还记得他。父亲却说记不得了，弄得人家挺尴尬的。我后来对父亲说，你就不会客气一下，说你记得他？父亲回答说，我教过那么多学生，哪能记得那么多？其实中国电力系统的许多领导干部和技术权威，包括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朱镕基、黄菊，父亲都教过，但他一概表示记不得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不通人情世故不趋炎附势的人。人们说，这样的人能长寿。

父亲这个人，心思都在工作上，子女教育基本上是母亲的事，但是在做人上，他对我们还是有基本要求的。我小时候念书很好，父母是满意的，但他们从来没有夸奖过我。记得小学毕业那年，考试考得好，已经知道能上清华附中了，本想好好玩上一暑假。不想，当时兼任清华图书馆副馆长的父亲却安排我去图书馆参加义务

劳动，为馆藏期刊贴新标签。结果好几个礼拜我都得去图书馆“上班”，父亲名曰“锻炼”。

我在清华园中长大，在附小和附中上学。本来我应该是家里上清华的第三代，但是“文革”粉碎了我的清华梦，18岁那年我就离开父母去山西插队了。五年后，我有机会被插队地方的农民推荐，作为所谓“工农兵学员”进入山西大学学习。当时我的希望是进外语系学英语，但是名额被别人走后门顶了，我被安排进了体育系，可想而知我当时的沮丧心情。入校报到前，我回到北京，父亲对我说，你上体育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你有外语基础，但外语只是工具，将来在体育方面或可凭借外语的优势在专业上占先机。父亲用的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后来我所走的人生路证实了父亲的远见。正是凭借外语的优势，我在“文革”结束后考上了运动生理专业的研究生，又通过考试获得国家公费留学的机会，拿到加拿大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再后来做外交官，在国内国家机关部委和地方政府“从政”，直至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现在看来，最早的“先机”都起了很大作用。人生常常是这样，你能一步走在别人前面，以后就能步步高先。当然，我没能有机会进入清华读书终究是件憾事。好在我的妹妹在1979年考上了清华，五年后毕业于父亲执教的电机系，成就了一家三代人读清华的佳话。

父亲年轻时喜爱体育运动，记得上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大兴体育锻炼之风，举行教工运动大会，我去观赛。父亲参加的是男子壮年组100米短跑比赛，以13秒的成绩夺冠。那时候我们家住新林院，

## □ 怀念师友



唐统一教授夫妇与儿子唐虔夫妇（左）、女儿唐纹夫妇（右）

门前就是个操场，每天下午操场上都是打球、跑步的教职工。当时电机系的教工篮球队是校内一支劲旅，好像是常迺教授为中锋，父亲与杨津基教授为前锋，钟士模教授与另一位前辈为后卫。我们这些小孩子常常在赛场外看父辈们在球场上鏖战。

由于身体底子好，父亲80岁时还能在校内骑自行车，后来因清华园里车水马龙太乱了，才被家人“勒令”不得再骑。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经历了几场大病，先是做了胆结石手术，得过一次肠梗阻，后来又摔了腿，做了股骨头更换手术，但他都坚强地挺了过来。两年前发现食管肿瘤，先后做了放疗和食管扩张手术，他很配合治疗，对生死也十分看得开。他住院时病房的医生护士都喜欢这个开朗诙谐的老头。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最后走得很从容，没有经受痛苦，得以善终。

我小时候父亲忙于工作，18岁那年我离家去山西插队，加上上学和工作，一去就是十年。“文革”后出国留学和工作，在加拿大又是十年。近二十年来一直在法

国工作，尽管每年都有机会回国，但总是来去匆匆，陪侍父母身边的时间并不多，心里总是过意不去，但父亲对此倒很理解。直到他晚年，身体逐渐虚弱，我才有意在家多陪他说说话，听他说些过去的事。父亲的一生应该说还是幸运的，尤其是他能熬过“文革”，又为国家的教育科研事业做了许多年的工作。也给我们作子女的以机会对他尽我们的孝道，使他得享天年。

父亲去世后，他的儿女亲家李鹏叔叔和朱琳阿姨送来花圈，缎带上书“敬爱的亲家唐统一教授驾鹤西去一路走好——亲家李鹏、朱琳敬挽”，并委派办公室主任和警卫参谋出席告别仪式。父亲早年教过的学生朱镕基同志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委托他的办公室致电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对父亲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家属表示慰问，并以他和夫人劳安的名义向父亲的告别仪式送来花圈。

2013年9月9日，清华电机系在清华园内为父亲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告别仪式。他一辈子在清华，最终从清华离去，这应该是符合他的心愿的。仪式上没有放哀乐，因为父亲一向不喜欢悲悲切切的东西，放的是父亲生前喜欢听的古典交响乐。来告别的父亲生前的同事、学生以及亲朋好友逾二百人。父亲这个人一生低调，葬礼上两位共和国前总理送来花圈，还有那么多的人来怀念他，应该说是极尽哀荣了，这也是对他献身教育一生的肯定。当然，以父亲的性格，他在天国一定会说，我不喜欢这么热闹。不过，这回却由不得他了。

2013年12月